

刘庆邦◎著

卧底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刘庆邦◎著

卧底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卧底/刘庆邦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411-2504-1

I. 卧… II. 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7683 号

卧底

WO DI

策划组稿 林文询
作 者 刘庆邦
责任编辑 谢明香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面设计 黄小骏
责任印制 晋 冰
责任校对 汪 平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504-1
成品尺寸 230mm×165mm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15.75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电子信箱 scwys@mail.sc.cninfo.net
印 刷 成都科利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028)86259301



作者简介

刘庆邦，

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

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

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级作家，

北京市政协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著有长篇小说

《断层》

《远方诗意图》

《平原上的歌谣》

《红煤》等六部，

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

《走窑汉》

《梅妞放羊》

《遍地白花》

《响器》等二十余种。

其短篇小说《鞋》

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中篇小说《神木》

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

根据其小说《神木》

改编的电影《盲井》

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红煤》

被称为当代中国的《红与黑》。

作品多篇被译成

英、法、日、俄、德、意

等外国文字。

出版说明

百年中国文坛，有过两次光荣的大喷发，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文学写作与文学出版中，病态与疲软的作品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喧闹浮躁，苍白肤浅。

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人，我们时时在思考：我们的时代，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我们应该为读者奉上怎样的作品？而究其根本，文学打动人力量在哪里？

思考和追寻的过程毫无疑问曲折艰辛。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腐水见底，泡沫散尽，露出来的即是粗糙的河床、冷硬的石头。近些年来，便涌现出了一批有良知的实力派作家。

他们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

他们的文风粗砺如沙，锋锐似刀。

他们写作的目的在于原生态地反映生活。

他们提笔的态度诚恳朴实，全然摈弃对于文学技巧的炫耀卖弄。

唯其真实，所以动人心肠。

唯其真实，它们充满力量。

唯其真实，我们从中能够听到广大民众最深切的呼声！

文学，从来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社会千百万人的命运。

我们怀真诚之心，将他们的作品聚合成书，结集出版，诚恳地奉献到读者面前。它的阅读过程也许不会轻松愉快，但至少能够让你感受到疼痛的力量——如果，你的心中尚有热血未凉。



目 录 *CONTENTS*

卧 底	/ 001
黑庄稼	/ 046
秋风秋水	/ 094
游 戏	/ 103
到城里去	/ 112
离婚申请	/ 158
过 年	/ 167
回 家	/ 176
神 木	/ 188

卧

底

周水明决定走这步险棋，是为了能拿出一份过硬的业绩，以证实自己的能力。

他到这家记者站应聘，司站长翻看了他交上的厚厚的见报稿剪贴本，并对他进行了面试，答应把他留下试用。司站长有言在先，试用期为三个月。在此期间，如果他表现出足够的新闻采访和写作能力，在报上发表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稿子，记者站就与他正式签订聘用合同，第一个聘期为两年。如果试用不合格，那就对不起了。目前试用期已过去两月有余，他心里一点儿也没底，吃不准司站长对他印象如何，愿不愿意跟他签订聘用合同。他自我回顾总结一下，觉得自己的表现还可以。前两个月，他干得马不停蹄，连双休日都不休息，都用来采访和写稿子了。第一个月，他发表了七篇稿子。第二个月，他发表了十一篇稿子。所发表的每篇稿子，他都不忘记署上司站长的名字，并把司站长的名字放在前面。他知道，见报的稿件报社是发稿费的，可他从没有向司站长问过稿费的事。人得学会吃小亏，吃不得小亏，就有可能吃大亏。周水明懂得其中的道理。他像是来参加考试，主考官只有一个，那就是司站长。他每天都盼着司站长给他打分。他曾参加过两次高考，每次等分数下来时他都悬着心，体重都会下降好几斤。第一次，他只差六分没达到录取分数线。第二次，他仍不敢表现出乐观，说这一次恐怕还不行。其实他心里暗暗有个估计，觉得这一次应该差不多。等分数下来，他再

2 || 卧 底

次受到打击，经过一年努力，他与做一名大学生的距离不但没有缩短，反而离得更远了，这一次竟差了二十多分。那时，他不知道谁在给他打分，没办法向左右他命运的人争取一些印象分。现在不同了，他和给他打分的人坐在一个办公室，司站长吸气出气他都听得见。他一定要给司站长留下好印象，在努力挣得业务分的同时，希望多得到一些印象分。走入社会这么多年，他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印象好坏有多么重要，若印象好了，看似办不成的事可以办成，若印象不好，原本能办成的事也会办砸锅。可司站长一直把态度平端着，从没有给他打过分，没打过高分，也没打过低分。他很想探探司站长的口气，因时间不到，他担心一探会探跑了气，探成半锅夹生的东西。他的心又一点一点悬起来，几乎和高考之后等待判分的时候一样了。他的办法只有多看司站长的眼色；或许能在司站长的眼色里得到一星半点信息。

他早早来到办公室，打了水，擦了地和桌子，就坐下来倾耳听着司站长的脚步声。司站长刚到门口，他就把门拉开了，轻声问着来了，伸手接司站长的手提包。司站长说不用，他还是把皮质提包接过来，紧走两步，把提包放在司站长的桌面上。他马上回转身，替司站长取下围在脖子里的团花带绦子的丝巾，挂在衣架的挂钩儿上。在他挂丝巾的当儿，司站长已把外套脱下了一半，他像是怕失去时机似的，又赶紧帮司站长脱外套，并把外套也挂在衣架上。司站长在椅子上坐下了，他的殷勤还没献完，摸着司站长放在桌角的茶杯问：“我把茶给您泡上吧？”

司站长说：“你忙你的，我自己来。”司站长拉开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一听新茶。

周水明已把暖水瓶提过来，打开了软木塞，说：“还是我来吧，您把茶叶放上。”

司站长说：“新茶你不会泡，水太热，一烫就把新茶烫死了。”

周水明噢了一声，像长了很大学问一样，说原来是这样。又问：“那怎么办呢？”

“你把瓶盖儿放在一边，敞着口凉一会儿就行了。”

“那好吧。知识处处有，我今天跟司站长又学到一种新知识。”

司站长说：“这是生活常识。”

和往日一样，司站长对他很和气，他至少看不出司站长对他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可是，他也看不出司站长对他有什么喜欢的地方。这使他对司站长更加佩服，还有些敬畏。人家的城府是怎么修炼的呢，咋就这么深呢！他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司站长一半的城府深度呢！他大概仍不甘心，站在司站长桌前，问今天有没有采访任务。他说的采访任务，指的是一些会议。作为一家全国性经济类报纸驻在这个省会的记者站，记者参加会议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一些专

业性会议，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每月都有好几个。一般情况下，会议报道都是由司站长亲自去搞。也有个别情况下，记者站同时收到两个或三个会议通知，司站长实在忙不过来，也会让他去参加其中一个会议。周水明因此知道了，记者每参加一个会议可以领到一个信封，信封里除了已经拟好的新闻稿子，还有二百三百块钱不等，名曰车马费或辛苦费。

司站长随便从桌上拉过一张报纸翻着，说没什么采访任务。见他站着还不离开，一副俯首听命的样子，司站长便又说了几句，司站长说：“要想当好一个记者，不仅要完成规定动作，更重要的是做好自选动作，我这个话你懂吧？”

周水明摇摇头，说不太懂。他好像听说过体操和跳水比赛有这样的说法，写稿子干吗还要做动作呢？

司站长解释说：“所谓规定动作，就是报社编辑部或上级领导交给你的报道任务，这个必须按时完成。自选动作呢，就是通过你的观察和采访，自己发现、自己选择、独立完成的新闻报道。这样的报道才能真正考验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实际能力。懂了吧？看来你还需要好好学习。”

周水明到底还是把司站长的口气探听出来了，人家说他还需要好好学习，这就是给他打的分啊，就是说他离当一个记者还有距离啊！他顿时觉得头有些蒙，脚心手心都在冒凉气，腿杆子软得像站在云彩上一样。他有点讨厌自己，曾对自己说过多少次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结果还是存不住气，惹得司站长把对他的评价提前露了出来。周水明该怎么办呢？还好，他没有失去理智，没有忘记对司站长的恭维，他说：“听司站长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我一定向司站长好好学习，为司站长争气。”

周水明不会放弃努力，晚上，他买了两瓶好酒，还买了一大盘上等的进口香蕉，提着到司站长家里去了。

司站长开了门，却不接他提的东西，说：“你来了就来了，还拿东西干什么！”

“没什么，我给您买了两瓶酒。”

“我自己在家从来不喝酒，你一会儿还是拿走吧！”

周水明有些尴尬，他低头瞅着门口的鞋架子说：“好，我换换鞋。”换了拖鞋，他自己把礼品放到客厅的电视柜前面去了。

在沙发上坐下，周水明像是想了一会儿才说：“司站长，我觉得您今天上午跟我说的话特别好，特别重要，我已经原原本本记在日记本上了。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教诲。”

“你说得过于夸张了。”司站长说，“小周不是我批评你，我觉得你对社会上负面的东西接受得多一些。”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接受您的批评，您的批评是对我的爱护。您给我指出

不足，我才好改正，才能找出努力的方向。”说完，周水明望着司站长，做出准备虚心聆听的样子。

司站长的话没让周水明完全失望，司站长认为他比较勤奋，比较刻苦，对新闻工作也比较热爱。但不要过多相信功夫在诗外，还是要在苦练内功上下功夫。既然想当一个记者，就要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能满足于发表一些小豆腐块儿，不能满足于能经常在报上见到自己的名字，只有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报道，才能产生影响，才能在新闻行业站得住脚。司站长一边说，周水明一边点头，他说好，好，记住了，他一定按司站长的话去做，争取尽快写出有分量的报道。

从司站长家里出来，司站长没再提让他把酒拿走的话，这让他心中暗喜，觉得自己给司站长送礼还是送对了。礼是什么，礼就是钥匙，你把礼送到了，才能打开那些当官儿的嘴。他要是不给司站长送礼，说不定司站长还是把嘴巴闭着，不会跟他说出实话。什么正面东西，负面东西，好酒闻着是香的，喝到肚子里是热的，谁能分清它是正面还是负面！初春天气，路边法国梧桐树上长的叶片才有猫头鹰的耳朵那么大，微风里还有一些凉意。篷大的树冠交头接耳，路灯掩映在枝杈之间，闪烁如猫头鹰的眼睛。整个下午，为筹备登门拜访司站长的事，他连晚饭都忘了吃，这会儿才觉得有点饿了。他拐进街边的一家小吃店，让服务员给他来碗面条。他以前在这里吃过饭，跟服务员说过他是记者，服务员认识他。服务员对他笑了一下，问他要不要喝点酒。他说喝什么酒，今天不喝了。面条要上得快一些。等面条期间，他把司站长说的话又重温了一遍。司站长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就是认为他写的文章都是些小豆腐块儿，没什么分量。从开始给报社写稿子起，他就听说过小豆腐块儿这种说法，人们把发在报纸上的短小文章，统统说成是小豆腐块儿。小豆腐块儿当然是一个贬义词，它不光代表小，还代表嫩，代表易碎，里面还有水分，一过夜就馊了。以前，周水明没有把小豆腐块儿和自己发的稿子联系起来，他对自己的每一篇见报稿都很珍视，都小心地剪下来，集中贴在一个专门贴剪报的大本子上，连一条二十字三十字的小简讯都不放过。他愿意时常把剪报本子看一看，并在空白处画上一些类似绿叶或兰草样的图案，以便对他的成果进行烘托。在他眼里，那些宝贝稿子跟金块子银块子也差不多，而绝不是什么小豆腐块儿。尽管司站长那样说了，他还是不愿承认他发表的稿子都是小豆腐块儿，有的稿子从所占报纸版面的面积来看，要比小豆腐块儿的单面面积大得多。不过他绝不能和司站长争辩，争辩的结果说不定比臭豆腐块儿还糟糕。剩下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危机迫在眉睫，他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尽快拿出一篇有分量的稿子来。

一碗面条没吃完，周水明就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这个决定让他有些激动，心口怦怦跳着，脸都红了。由于激动和走神儿，面条他吃吃停停，是咸是

淡都没吃出味儿来。这个决定是他准备装扮成一个打工的农民工，深入到一个小煤窑去卧底，把所见所闻记下来，然后写成长篇通讯。他相信，只要通讯一发出来，肯定有着爆炸般的效果，说不定会轰动全国，很多报纸都会转载。到那时候，他就不必发愁姓司的不聘他当记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周水明听说过，西部深山窝子里有一些小煤窑，窑主派人到火车站汽车站等农民工密集流动的场所，把农民工骗走。一旦骗到窑里，他们就把农民工严密看管起来，强迫农民工像牲口一样给他们干活。他们喂给农民工饭，为的是把农民工喂饱了好有劲给他们挖煤。他们把钱把得死死的，一分都不给农民工发。谁胆敢逃跑，若被他们捉住，一律严惩不贷，轻者痛打一顿，重则敲断腿骨。这样的窑旧社会就有，那时叫做圈窑，猪圈羊圈那个圈。现在这样的窑还没人为它命名，不知该叫什么窑。这样的口头信息他听到不少，在报纸上也见过一些零零碎碎的报道。但不管是听来的还是见到的，都是间接的消息，属于第二手或者第三手第四手资料。当事者肯定是有的，而当事者在信息传播中却是缺席者，不知道他们都消散到哪里去了。由于缺乏当事者的直接陈述，那些信息就显得无关痛痒，既没有切实的分量，也不具备振聋发聩的震撼力。在这样的关头，周水明只好把自己豁出去，勇敢地把责任承担起来。

第二天上班一见到司站长，周水明就将自己的决定对司站长说了。他想说得平静些，因事关重大，个别句子说得还是有些磕巴。他以为司站长会对他的决定感到惊讶，并对他大加赞赏，然而司站长的眼皮缓慢地动了两下，在肯定了他的想法很好之后，马上提示说：“你要慎重考虑，这样的行动是要担一定风险的。”

周水明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仿佛已经上来了，他说：“风险我不怕，我反复考虑过了。为了揭露不法势力，维护农民工的利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司站长闭着嘴巴微笑一下，还微微摇了摇头，随即以严肃的表情对周水明指出两点，让周水明记下来：“一，记者站没有要求你去小煤窑卧底采访，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二，你要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自己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

周水明说记住了。

“你最好记在采访本上。”

周水明拿出随身带着的小采访本，把司站长指出的两点记在了本子上。在听到司站长指出的两点时，他并没有从脑子里过，以为不过是领导对他的一般化例行交代。把司站长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往本子上记时，他才觉出这些话有些沉重了，悟出司站长话后面有话，是后话，有这些话记录在案，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司站长就可以据此推卸责任。他心里寒了一下，才稍稍冷静些，意识到自己这次去卧底的确不是闹着玩儿的。他对司站长也说了两点：“等我把稿子写

出来，一定以咱们两个的名义发表；我这次卧底计划去七天，七天之后，如果我不能跟您取得联系，请您跟公安机关报一下案，让他们帮助您查找我的下落。”

“我希望你能按时回来。祝你一切顺利恐怕不大现实，好，祝你取得成功！”

二

去卧底之前，周水明还要回一趟家，筹备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必备的行头，要把自己装扮得确实像个农民工的样子。比如他必须穿一身旧衣服。旧衣服不一定破，不一定打补丁，但一定要旧，旧得皱巴巴，脏乎乎，而且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衣服都要旧。比如皮鞋是不能穿了，最好穿一双少鼻子瞎眼的球鞋。再比如他还要带一条早些年淘汰下来的粗布被子，把被子卷巴卷巴塞进塑料编织袋子里。另外，这次冒险行动他得跟妻子说一下，顺便跟妻子亲热一番。他已经二十多天没回家跟妻子亲热了。

他的家在一座国营大型煤矿，离记者站所在的省会一百多公里。从长途公共汽车上走下来，周水明俨然是一副记者的形象、派头和风度。他西装笔挺，穿着皮鞋，打着领带，头发抿得一丝不乱，手里提着精致的真皮小皮包。他拉开小皮包，拿出一副眼镜戴上了。他的眼睛不近视，也不散光，他戴眼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视力，也有那么一点向明星看齐的意思。他的眼镜是水晶平光镜，在阳光的照射下稍微有一点变色，变的色是蓝灰色。这样，他能看清别人的面目，别人看他的眼睛就看不大清楚。这副眼镜，是他参加一个水晶产品的推介会时主办方送给他的，据说值六百多块钱哪。他现在戴的红色领带也是厂家送给他的，领带上绣着金色小花儿，是世界名牌。周水明还没当上正式的记者，就得了这些实惠，等他真正当了记者，实惠不知道有多少呢。从国道边到矿里还有五六里路，一些开三轮嘣嘣车的司机冲他迎上来，叫他老板，请他坐车。他摆摆手，表示不坐。以他现在的身份，要么坐小轿车，要么步行，坐这等开起来扭来扭去的嘣嘣车算什么！

走到半路，周水明碰见了他当年在掘进队时一块儿搞掘进的一个工友，他先跟工友打了招呼。工友说：“嗬，周大记者！”工友向他身后看了看，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你还要什么人？”

“这么大的记者，不带保镖怎么行！”

大记者的称谓让周水明很受用，他说：“哪有记者带保镖的！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幽默。”

周水明和工友的话还没说完，一辆黑色红旗牌小轿车从他身边开过去，他认

出这是该矿矿长的车子。他正想不知矿长在车里坐着没有，车子在前面停了下来。他以为是矿长看见了他，从车窗里探出头的却是井庆平，井庆平让他上车。

他不想沾井庆平的光，往前挑了两下手梢儿说：“你先走吧，一会儿就到了。”

井庆平开门从车里下来，说：“快上来吧，我正要找你呢，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了。”

周水明只好紧走两步，上了车。矿长不在车上，井庆平在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坐着。井庆平吃得一头一脖子的肉，头发也留得很长，时髦得像是一个影视导演。井庆平说了正要找他，不说什么事，却回过头笑着问他：“怎么样？”

周水明说：“还可以。”

“不行到我们报社来吧。”

“谢谢！什么时候等你当上总编再说吧。”他以前不是没找过井庆平，井庆平说这不行，那不行。现在他到记者站去了，井庆平才敢说这个大话。他要是真的答应去报社，井庆平不知又该怎样拿捏呢！再说，井庆平不过是一个普通编辑兼记者，他也没权力让他进报社。

井庆平说：“真的，你光当记者不行，当记者的还得巴结编辑，不然你的稿子还是发不出来。记者是卖方，编辑是买方，你把编辑记者都当着，等于卖方买方一肩挑，省去了中间环节，你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益。”

“你还总结出经验来了。”

“那当然。这一行学问大着呢！”

“你不是在市里买了房子吗，还回矿里干什么？”

“房子正在装修，等装修完了，我就把家搬过去。”

周水明跟井庆平开了一个玩笑，说：“房子装修完了，你的家也不要忙着搬，有两间房子在市里空着，你搞情人多方便。”

井庆平乐得喷屁，说：“对，对，你这个主意太好了，就照你这个主意办。你搞到情人，也可以带到我那里去。”

说话间车已经到了矿里，周水明让司机把车停一下，他先下了车。

周水明不能不承认，他之所以到记者站去应聘，主要是受了井庆平的影响。原来井庆平和他一样，都是在矿上的宣传科当干事。井庆平看到市里工人报招聘采编人员的启示，就悄悄跑到报社去应聘。井庆平后来说，他去应聘，一点把握都没有，趁着到市里送稿，权当到报社玩一下。连自己都没想到，经过笔试和面试，他还真的被人家聘上了。井庆平一当上记者，他的活动舞台就大了，除了市里有好几个区，市上还管着周边七八个县，都是他的报道范围。井庆平的能量也很大，很善于发挥当编辑记者的优势。他想到哪里采访，就要那个单位派车接他，不接他就不去。他去采访过了，发了稿子，再去那个单

位，就事先准备一些发票让人家给他报销。他报销的发票五花八门，票值逐步升级，先是一些打的票、鞋票、衣服票，后来买的照相机、手机、电脑、彩电等，也开了票找被报道单位报销。再后来，井庆平嫌报销发票太麻烦，也容易给人家留下把柄，就不报销发票了，就以各种巧妙方式跟人家要现金。现金被他说成辛苦费、赞助费或红包儿。因人生得意，井庆平的这些作为并不瞒着周水明，愿意在周水明面前吹一吹。井庆平说，现在他每年的收入不下十几万。在市里买了房子只是他的第一步，下一步他还要买汽车。有一次井庆平把酒喝多了，抱了他的脖子，嘴凑在他耳边说：“你不知道，当记者的好处多着呢！”他还没问有哪些好处，井庆平就说开了，现在下去采访，只要你在那过夜，人家都要给你安排一下。这个安排一下不包括喝酒，喝再高级的酒都是小菜一碟，排除在外。安排的系列内容包括唱歌，跳舞，洗头，洗脚，按摩，找小姐。这些项目里面，找小姐最有意思，算是重头戏。他问井庆平一共玩儿过几个小姐了。井庆平说，说实话，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井庆平的话，周水明有的信，有的不信。但有一个事实在那里明摆着，他不愿意相信也不行，那就是井庆平的确在市里买了房子。一套房子二十多万，这表明井庆平狗东西真的发财了。有一段时间，他不愿想到井庆平，更不愿提到井庆平，极力想把井庆平忘掉。一想到井庆平，他就感到别扭，还有些焦躁，肚子里像长了个瘤子一样。有一次正吃饭时，妻子提到井庆平，说井庆平找了矿长，把老婆弄到幼儿园当老师去了。他一听就对妻子发了脾气，差点把饭碗摔在地上。事后想了想，他心理不平衡了。说得不好听一些，他嫉妒井庆平了。与井庆平相比，他觉得自己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井庆平强一些。井庆平只会写一些简单的报道，报道里多有不通的句子，还常常出现错别字。他不仅会写报道，还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散文和诗歌，文字当然要准确和优美得多。在为人方面，井庆平自控能力很差，一喝酒就过头，一过头就闹事。有一回闹到书记那里，摸过书记桌上的烟灰缸，把烟灰缸里的烟灰当茶喝，把书记的玻璃烟灰缸都摔碎了。他和井庆平等多次在一块儿喝酒，他也曾喝高过，但越高他似乎越清醒，从没有失去过应有的意志力。井庆平的长相也不好，矮个子，大耳朵，肚子鼓着，肥得像猪。他身材适中，不胖不瘦，别人对他的评价是眉清目秀。论能力，论才华，论为人，论仪表，他哪点比井庆平差！他在宣传科一年满打满算才挣一万块钱多一点，井庆平一年却能挣十多万，收入是他的十倍，凭什么？难道人的工作岗位不同，差距就这么打吗？人的价值也不一样了吗？既然井庆平能去当记者，能提高自身的价值，他为什么不能呢！宣传科有人问过他，是不是见井庆平跳槽成功，他就坐不住了。他表面不愿意承认，心里盯的还是井庆平，一定要和井庆平比一比。

周水明回到家，见妻子田少荣正在床上睡觉，知道妻子上的是夜班。妻子

在矿上选煤楼捡矸石，对于矿上的女人来说，妻子干的是最脏最重的活儿。因他是单身职工，妻子的户口不在矿上，矿上就不给妻子安排工作。捡矸石的活儿是妻子自找的，临时性的，一个月才挣四五百块钱。他说过不让妻子去捡矸石，妻子说，两个孩子都上学去了，她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出去能挣一个是一个。妻子也把他叫大记者，说：“大记者回来了，不睡了，起来给大记者做饭吃。你还没吃饭吧？”

见妻子赤裸着上身，他对妻子的小小身子顿生怜惜，说：“你不要起来，我这会儿不想吃饭，先陪你睡一会儿。”

妻子笑了一下，知道他要先干那件事，说：“我就知道你……”

周水明插上门，迅速脱下衣服，脱得只剩下一件三角裤衩，躺进被窝里去了。进了被窝，他才把裤衩揪下来。那件东西已经奋起，对裤衩有些戗茬。他戗着茬儿把裤衩退掉，那件东西马上弹回向上的位置。他把妻子紧紧搂了两下，示意妻子也脱去裤衩。

妻子说：“别急，咱俩先说会儿话。来，让我看看你瘦了没有。”

他说：“不行，我得先进家，进了家才能说话。”他把妻子的下面说成是他的家，做爱就是进家。他没有跟妻子说将去卧底的事，那个事情怎么说也有些重大，他怕说出来会影响妻子的情绪，也会影响他自己的情绪。他去记者站应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他也没跟妻子说起过，他跟妻子说的是，他已经当上了正式的记者。

妻子撒了一点娇，说：“那，你得给我脱。”

“愿意为你服务，老公亲自给你脱。”他把被子掀开，看到妻子穿的是那条墨绿色弹力尼三角裤衩，顿感不悦。这件裤衩是妻子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他说：“我说让你把这个裤衩扔掉，你怎么还是穿上了？”

“穿上怕什么，下面只烂了一个小眼儿，缝缝洗洗，一点儿都不耽误穿。”

“你知道这是什么人穿过的，要是染上了性病怎么办？”

还是妻子自己把裤衩脱下来了，扔在一边，说：“你仔细看看，我染上性病了吗？”

他把妻子的两腿分开看了看，妻子下面干干净净，好像没有什么性病的迹象。他把“家”进去了，似乎还有意见没表达完，说：“怕染上性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你这么做，对我的尊严是一个伤害。我在省会当记者，让老婆在垃圾堆里捡裤衩穿，别人知道了怎么看，显得你丈夫多没本事，多没面子！”

“我在里面穿，除了你能看见，谁能看得见！”

“我看不见也不行，我一看见就堵心。怎么，咱连条裤衩都买不起了？下次回来，我要给你买一打裤衩，让你三年都穿不完。”说着把妻子的两只毛眼各亲了一下，下面也进得彻底些。

妻子把“家”门关紧密，再关紧密，说：“等你给我买回裤衩，我就不去捡矸石了，上街卖裤衩去。”

“我×，你真是我的勤俭持家的好老婆呀！”

亲热完毕，他让妻子给他找旧衣服旧被子时，才把准备去小煤窑卧底的事对妻子说了。他没说卧底，说成化装私访。

私访的事，妻子似乎从戏台上和电视剧里看见过，她说：“私访的不都是当官的嘛，你一个记者私访什么！”

“这个你就不懂了，当记者才更要私访。过去只有当官的，没有当记者的，私访的事只能由当官的承当。现在有了记者，私访的事就主要由记者去做。当记者的比一般当官的地位还要高一些，你知道吧？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这个我跟你说你也不懂。”

妻子对小煤窑的情况多少知道一些，小煤窑多是险恶之地，她有一个姨表弟就是在小煤窑里被砸死的。她有些担心地问：“你去小煤窑私访，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他说不会的，下去私访的记者很多，没听说哪个记者出过大的危险。周水明没有对妻子说司站长对他的工作不甚满意，没有说他下去私访是迫不得已，为了得到司站长的信任。他肚子里还有好多话，都没跟妻子说到。比如说只有在记者站干稳了，才能多挣一些钱，才能买商品房，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才能有保证。不然的话，他家的经济状况一辈子都很难有大的改善。他跟妻子唱的是高调，把自己此次行动的目的说得很堂皇，很高尚，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夸耀。他把什么喉舌、天职、拯救、义不容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等大的词句都用上了，把妻子说得愣怔着。他跟司站长说的是计划下去七天，跟妻子说的却是十天，他说：“十天之后，我若是不回来，你也不要着急，但你可以到记者站找司站长问一下情况，必要时让他到公安机关报一下案。”

妻子说：“你越说我越害怕，咱不去小煤窑私访不行吗？”

“我一定要去！”他的表情和口气像是有些悲壮了。

“你去看看就行了，能不下窑就别下窑。”

“开玩笑，不下窑怎么能知道窑下的黑暗！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会随机应变的。”

他的那些旧衣服旧鞋和旧被子亏得妻子没舍得扔掉，从床下的旧木箱里一翻就翻出来了。他换上旧衣服，把头发揉乱，对着镜子照了一下，着实吓了他一跳。他似乎看到那个高考落榜后曾四处流浪的落魄青年又回来了。他曾以为那个倒霉蛋已离他远去，再也不会回来，谁知道呢，眨眼工夫，那小子又立在他面前。那身散发着霉味的衣服，好像也在以皱巴巴的表情笑话他说：“你不是已经混出人样了嘛，不是把我们抛弃了嘛，为何又回到我们的怀抱，你这

是玩儿的哪一套？”周水明苦笑了一下，体会到人的一张皮原来这么重要。他穿上那身皮，就是一个体面的记者；换上这身皮呢，就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

别看妻子自己愿意从垃圾堆捡裤衩穿，却不愿看到丈夫穿旧衣服，她说难看死了，让丈夫把衣服脱下来洗一洗再穿。

周水明说不能洗，一洗就没有现在的味道和效果了。

三

周水明把冷眼装在脑子里，是以十分清醒的状态被骗工的骗子骗走的。他原以为遇到骗子不是很容易，准备花一天或两天时间把自己送到骗子手里。不料，他只用了半下午时间，就与他预先设定的骗子遭遇了。

他选择的地方是一个长途汽车站，全省各市县的汽车都往这里开，有人下车，有人上车，这里是来往旅客的一个集散地。加上汽车站对面不远就是全国有名的枢纽性火车站，更使两站之间的广场形成了人的洪流，和若干个人的旋涡。不少人拉着箱子，背着挎包，在匆匆行走。不少人边走边对着手机说话。一个包工头模样的人对着手机大声骂人，嚷着他一定要报仇。不少人在散发小广告。不少人手拿写着所谓国营旅馆的硬纸牌在招徕顾客。不少涂着红嘴蓝眼的野鸡在悄悄拉人的衣角，问人要不要找个地方快乐一下。当然也有不少带着以塑料编织袋子为包装的粗笨行李的民工，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眼巴巴地等着用工的人把他们领走。记者站设在省政府附近的一个省属行政机关，离这里并不是很远，但他觉得这里和那里判若两个世界，他到了这里如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有些兴奋，意识到他的体验已经开始，可以进入采访状态。如果是往常，他会掏出自己的小采访本儿，把看到的情景记上几笔。他参加过矿务局矿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学习班，受过一些采访方面的基本训练，其中一项训练要求就是勤动笔。谚语是，好记性比不过烂笔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了，一摸里面是空的，没有采访本儿，也没有笔。他的动作是习惯性的，下意识的。他的采访本儿和笔放进一个小手包里去了，还有手机、记者证、钱包儿、真的身份证等，都放进了小手包里。他把小手包上了小锁，外面还裹上了黑色塑料袋，压在铺盖卷儿的最下面。小手包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不能露出来，露出一样就有可能暴露他的身份。他看过一个资料，一个国民党的司令官，战败后化装逃跑了，他本来已逃出层层包围圈，因解完大便用白纸擦了屁股，还是被人认了出来。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接受那个司令官的教训，处处小心，步步谨慎，不能把记者的身份露出蛛丝马迹，只能以民工的身份和面目示人。他也不能待在太显眼的地方，要是碰见井庆平那样的熟人就麻烦了，他现在这身打扮，恐怕得解释一会儿才能解释清楚。他站在汽车站出口处一家小吃店的墙角，低着